

邓小平新闻理论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

张秋娅

内容提要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基本观点,并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对新闻的性质和作用、新闻的真实性、正面宣传与新闻批评的关系、新闻改革等新时期新闻学理论的热点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新闻思想。

关键词 邓小平新闻理论 毛泽东新闻思想 新闻真实 新闻批评 舆论监督 新闻改革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新闻工作,并且身体力行地抓新闻工作。早年旅欧时,他曾是党的刊物《赤光》杂志最年青的编辑。红军时期,他主办过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亲自动手写评论、写消息。建国后,他在所领导的工作范围内,以内行的眼光关注着新闻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过程中,也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新闻思想。

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媒介应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新闻媒介的信息传播工具的作用,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开拓发展。

关于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党的新闻工具是党的喉舌,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例如,1925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第一句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1]抗日战争时期,他说,党的领导人“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2]。解放战争期间,他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3]“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4]1949年,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由革命战争转向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及时指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5]。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又提出“在世界上存在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6]。因此,新闻工作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我国新闻媒介总体上也长期充当着“阶级斗争的工具”。

对于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基本观点,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早在建国初期,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7]认为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这不仅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核心。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把新闻媒介看作是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说话的。在上述报告中,邓小平又说:“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8]强调了新闻媒介反映群众的愿望和意见,作为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和新闻媒介作为党的喉舌的一致性。因为,党是人民利益最集中的代表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因此,党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新闻媒介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百废待举,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极为重视新闻媒介在安定团结中的重要作用,1980年初,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9]因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0]。在这篇讲话中,他又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11],以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自由化思潮对安定团结的干扰。邓小平的论述,是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新闻思想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就要为党的中心工作经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同时,邓小平的论述也纠正了新闻媒介充当阶级斗争工具的错误。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强调新闻媒介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是完全正确的,不如此,就不能在同强大的敌人斗争中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但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敌我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以后,仍强调新闻媒介是革命斗争的武器,并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不仅会搞错革命的对象,引起混乱,也不利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挥新闻媒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邓小平强调新闻媒介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从而使我国新闻界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移,这是毛泽东曾经讲到而没有实现的。

与此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2]从而提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问题。不言而喻,新闻也是精神文化产品之一,也应该通过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反映各方面的情况,普及知识,提供文化娱乐等等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论述,肯定了人民群众对新闻等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和新闻媒介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在这方面,毛泽东曾在50年代对老报人、《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说:“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13]也意识到新闻媒介为人民提供精神文化娱乐的作用。但由于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再提了。

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还深刻认识到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的作用,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84年9月,他专门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4]为新闻媒介提出了当好

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任务。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他仍然强调:“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15]邓小平关于新闻媒介的信息服务功能的论述,是根据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方面,改革开放需要对外交流和广泛的社会交往,借鉴学习别国他乡的经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指令性的东西少了,靠市场调节多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也需要大量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介的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耳目。这一点,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可能看到。建国以后,又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失去了机会,因此,毛泽东对新闻媒介作用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概括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提出新闻工作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16]。这一提法,恰当而科学地表述了邓小平的论述。可以说,邓小平关于新闻媒介性质和作用的论述,既继承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又在新闻观念上对毛泽东新闻思想有了开拓和发展。

二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新闻的真实性,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精髓在新闻理论上的体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新闻思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离开了真实,新闻就失去了价值。新闻的真实包含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两个方面。所谓微观真实,是指每一篇具体新闻所反映的事实要完全真实、准确;宏观真实则指从社会客观的大背景和事物发展的总体结构上把握新闻的真实性。微观真实是宏观真实的基础,宏观真实又反过来指导和影响微观真实,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新闻的微观真实,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他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文中曾指出:“文字和材料都是要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17]然而,新闻的真实仅仅有微观真实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要找几个事例来证明某个观点并不难,尽管这几个事例是真实的,但与总体上的真实情况不符,就会失真;第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千万万,新闻报道只能反映其中的一小部分,这里必然伴随着选择的过程,在选择过程中,如果只注意此事物本身是否真实,不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关系出发进行比较权衡,也难免失真;第三,对一个事物只谈其利,不讲其弊,或者任意分割,各取所需,抓住一点,随意夸张,也会造成新闻的片面和失真。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的新闻报道有一个顽症:经常出现一点论,一边倒,一窝蜂,象大跃进时期报纸上的“浮夸风”,“文革”期间的虚假风都是最典型的,尤其是林彪、“四人帮”提出“事实为政治服务,为路线斗争服务”,使得“假、大、空”的所谓“新闻宣传”充斥着各种新闻媒介。

邓小平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新闻的真实性。对于新闻的宏观真实性问题,他有自己独到而精湛的见解。建国初期,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看法,他说:“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

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18]邓小平指的是什么呢?原来,1950年5月9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消息,报道4月18日土匪袭击邻水县高兴乡,抢走公粮7000余斤和部分武器,而剿匪部队没能及时赶到的事情。消息旁边,报社专门发表了题为《勿因初步胜利而骄傲麻痹》的短论,批评剿匪部队和当地干部“在剿匪取得初步胜利后,产生了太平观念”、“松懈”,因而“遭致土匪袭击”。虽然,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具体事实完全真实,就这件事本身而言进行的批评也是客观的。但消息报道的是4月中旬的事。4月底以后,西南剿匪已不是“初步胜利”,而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剿匪部队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连续战斗,时有指战员壮烈牺牲,因而这篇专论所依据的事实与专论发表时总体上的真实情况已相去甚远,专论也就失去宏观真实性了。因此,邓小平说:“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这篇专论“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19]。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论述了要从社会客观大背景上把握新闻的真实性,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邓小平还把两点论运用于指导新闻工作,他说,报社对“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20]。80年代初,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谈到:“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21]。从而指导人们克服片面性,从事物发展的多方面联系上把握新闻的宏观真实。

从社会客观大背景和事物发展的多方面联系上把握新闻的真实性,往往比把握新闻的微观真实更难、更重要。邓小平对新闻宏观真实性的论述,为新时期确保新闻的真实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新闻思想。

三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提倡开展正确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纠正新闻批评上的“左”、“右”两方面的错误倾向,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另一个发展和建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以安定团结为中心的正面宣传方针,他说:“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22]新闻媒介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责无旁贷地应该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讴歌人民的英雄业绩。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当然,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不要新闻批评。我们党历来重视新闻批评,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根据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的新情况,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3]。1954年7月17日,党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进一步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24]。这两个重要文件为新闻批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据统计,那段时期,《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表批评报道1.7篇;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当月发表批评

稿件150篇,平均每天达5篇。那段时期,是我党我国最重视新闻批评的时期,也是国家、人民生活比较正常和生气勃勃的时期。尽管当时也有失误,如在“三反”、“五反”、“反胡风”和电影《武训传》、小说《红楼梦》的讨论中批错了一些人,但毕竟不属于主流。应该说,当时那种良好的新闻批评风气,与毛泽东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1954年毛泽东为报纸上的批评制定了“开、好、管”的三字方针,认为应该开展新闻批评,但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并由党委管起来。1957年初,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25]。他还说:“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26]。这些都是关于新闻批评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可惜,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毛泽东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违背了他原来一些很好的思想,结果,报纸上的批评变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常的新闻批评也就没有了。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四人帮”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27]他呼吁:“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28]。邓小平从“文革”的反面教训中看到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新闻批评所产生的恶果,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阐述其必要性。开展新闻批评,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他在指导西南新闻工作时,曾提出办好报纸的三个条件是“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29];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30]。正常的新闻批评,不仅是党领导的事业及自身建设的需要,还有利于反映群众的愿望和意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群众的情绪通过正当的渠道得到了疏解,不至于来个“总爆发”,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新闻批评对提高新闻媒介的形象和新闻宣传的效果也极有利,经常有一点严肃认真的批评,新闻媒介就更有威信和生气。

鉴于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注意新闻批评的方式。1980年,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报纸上的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31]强调新闻批评的事实要准确,分析要客观,纠正了在新闻批评中把什么都说成一团漆黑的“右”的倾向。同时,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路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指出:“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事实求是的科学分析”;“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32]认为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要以说服教育为主,批评要出以公心,着眼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防止重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路,也纠正了新闻批评中“左”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关于正确开展新闻批评的论述,无疑是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新闻批评逐渐向更完备的形式——舆论监督发展。舆论监督包含新闻批评,又不等同于新闻批评,它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和政府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媒介对社会进行的监督,它更体现出新闻媒介在新闻批评中的主动性和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有利于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也带来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

制,贪污和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就会大幅度增加。舆论监督是监督制约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腐败,法律是惩恶于后,舆论则是教育、防范于前,有防止腐败滋生的作用。1989年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中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33]这里的透明度指的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不仅能防止腐败,更重要的,它还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形式。50年代,邓小平曾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34]。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监督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舆论监督,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团结、民主、和谐融洽的社会环境,这是邓小平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注入的新的时代内容。

四

坚持和深化新闻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对新闻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邓小平对于新闻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给予的回答,为毛泽东新闻思想增添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以后,我国新闻工作所处的国内外社会环境,新闻报道的内容、手段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观念、旧传统仍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宣传报道模式,那些先验式的、唯上唯书的思想观念,仍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表现为新闻报道的视角狭窄,手法陈旧,内容表面化、公式化、概念化。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中,唯一提到新闻媒介的地方,就是批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35]。这就精辟地阐述了新闻改革的必要。

那么,新闻改革是否能照搬经济改革?新闻改革以经济效益为重,还是以社会效益为重?对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和认识上的模糊,邓小平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给予了回答。他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36]。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就是要在新闻改革中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面向群众上来,使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更贴近人民、贴近实际,增加其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和服务性,并为此改善新闻单位的经营管理。总之,要使新闻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符合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改革开放中,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侵袭到新闻队伍,新闻界出现了“有偿新闻”等以稿谋私、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新闻媒介的声誉,危害了读者和受众的利益。1983年邓小平在批评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和文艺界“一切向钱看”的歪风时,愤慨地指出:“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37]。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向钱看,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

邓小平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指引着新闻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多年来,我国新闻事业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首先是新闻媒介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除了报刊以外,大量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建立;报刊中,除了党报,专业报、行业报等不同门类的报刊纷纷产生;电视台中,除了中央、省、市电视台,还建立了大量县、厂矿单位电视台;广播电台中有经济台、信息台等专业电台,新闻媒介的数量和种类成十、成百倍地增加了。其次,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信息量大增;形式更加新颖多样,现场直播、街头采访、专家访谈、民主讨论等等,文字也更加生动活泼。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新闻改革是毛泽东没有遇到也没有论述过的问题。敢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新闻改革之路,把毛泽东新闻思想灵活地运用到新闻改革的实践中,充分地表现了邓小平发展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理论勇气。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邓小平新闻理论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邓小平的新闻理论既高屋建瓴,又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实践的。

注释

[1][2][4][13][1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页、第113页、第156页、第188页、第2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页、第1428页。

[6]转引自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7][8][18][19][20][29][30][34]《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5页、第150页、第146—147页、第148页、第146页、第150页、第270页。

[9][11][12][21][22][27][28][3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第272页、第128页、第316—317页、第255页、第144—145页、第257页、第366页。

[10][15][32][33][35][36][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第306—307页、第47页、第313页、第381页、第145页、第43页。

[14]《邓小平生平与理论研究汇编》第347页。

[16]《求是》1990年第3期。

[23][24][25][26]《新闻工作文献选编》第254页、第268页、第85页、第83页。